

2009

科举学论丛

第一辑

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 上海嘉定博物馆 编

线装书局

2009

科举学论丛

第一辑

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 上海嘉定博物馆 编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9科举学论丛. 第1辑 / 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 上海嘉定博物馆编. — 北京: 线装书局, 2009. 6
ISBN 978-7-80106-954-2

I. 2… II. ①上…②上… III. 科举制度—中国—文集
IV. D6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4397号

2009 科举学论丛(第一辑)

编者: 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 上海嘉定博物馆

责任编辑: 杜 语

责任校对: 徐征伟

封面设计: 闻 康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福建三明益晨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6.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册

定 价: 60.00元(全2册)

科學學

丁亥王明



2009 科举学论丛 第一辑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伟国 李瑞阳 陈燮君 武克全 潘世伟

学术委员会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日根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王炳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邓洪波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朱瑞熙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刘海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杨学为 (教育部考试中心)
李世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何忠礼 (浙江大学历史系)
张亚群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张希清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祝尚书 (四川大学中文系)
陶继明 (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
黄霖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龚延明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章培恒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商志耀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葛剑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傅璇琮 (中华书局)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科举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燕小明
副 主 任: 王 漪 齐春明
委 员: 包仕武 王其良 邵 辉
主 编: 王 漪
执行主编: 齐春明
副 主 编: 包仕武 邵 辉 徐征伟
成 员: 徐征伟 林介宇 慕 颖
金 蓉 马剑颖
执行编辑: 徐征伟 林介宇

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南大街183号

邮编: 201800 电话: 021-59920087

E-mail: kejuxuelc@yahoo.com.cn

目 录

论文

赓续钱大昕的未竟之业：谈元代进士录的重构·····	萧启庆（02）
清代八股文选本稿本的文献价值初探·····	马 鏞（09）
查嗣庭案与清代江西乡试·····	姜传松（15）
十国科举试赋考议·····	孙福轩（25）
徐光启中举四书文辑佚与考辨·····	黄 强（31）
明代的交趾进士·····	刘志强（34）

科举家族研究

清代完颜家族的文化贡献·····	张 杰（41）
王懿荣家族对地方教育的贡献·····	佟守琴（47）
清朝聊城科举家族傅氏研究·····	王 雁（54）

访谈

深入开展科举研究 弘扬中华文化 ——张希清教授访谈录·····	张希清 徐征伟（62）
------------------------------------	-------------

综述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甘宏伟（66）
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林介宇（70）
传承中华文明 弘扬科举文化 ——《科举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徐征伟 林介宇（75）
2008年科举研究论著目录·····	刘海峰 刘希伟（77）

“中国科举文化展”巡礼

“中国科举文化展”在哈尔滨禹舜美术馆展出·····	马剑颖（91）
---------------------------	---------

封面：岳麓书院文庙牌坊（明代）

封底：岳麓书院文庙全景

嶽麓書院

於斯為盛

惟楚有材

藏之名山

納于大麓

赓续钱大昕的未竟之业：谈元代进士录的重构

萧启庆

一

嘉定钱大昕（1727-1804）是乾嘉时代首屈一指的史学大师，学识渊博，考证精密，元史是他的一个主要研究范畴^[1]，对元代科举文献用力尤勤，生前广稽群籍，编纂《元进士考》一书，惜未完成。比他年轻一甲子的后辈徐松（1781-1848）是道咸时代西北史地之学的名家，却撰成《登科记考》，在唐、五代各科登榜者三万人中，考得十分之一，填补这两时期登科记荡然无存所留下的空白。钱氏在学术界的声誉虽高于徐氏，但其《元进士考》在后世所受重视远不及徐氏《登科记考》。

《登科记考》流传甚广，学者对其评价很高，视之为唐朝及五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2]，为之增补者至今络绎不绝^[3]。钱氏《元进士考》则由于为一未完成的稿本，近年以前一直长埋于书库之中^[4]，罕为人知，引用者更少，未能发挥影响。

钱、徐二大史家在这方面的工作原极重要，因为科举是隋、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相互联结的重要机制，而“登科记”或“进士录”则是研究这些方面历史的重要史料。唐后各代，仅有明、清两代仍保存大多数的进士录^[5]，过去学者运用此类史料研究这两代历史已有卓越成绩。此外，辽、宋、金、元等朝的进士录或仅存一二种，或已完全亡佚。由于此一工作的重要，近年不少学者从事这几代进士录的重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宋朝是科第社会成立时期，前后共历118科，登科者约十至十一万人，现在传世的进士录唯有两科，其余皆有待收辑。最近傅璇琮与龚延明等教授出版

《宋登科记考》，考出进士四万多人，颇为丰硕，令人鼓舞^[6]。关于辽朝，已有朱子方所撰《辽代进士题名录》一文，辽朝共开科53次，录取进士2,211人，朱氏辑录所得仅有进士190人^[7]。金朝举行科举31次，录取进士约为4000余人，近年出版的薛瑞兆《金代科举》中辑得进士千余人，并列有详略不一的小传^[8]。可见由于各代现存相关史料多寡不一，学者重构这几代进士录的成果也丰俭有异，但都已作出全面的尝试。

二

钱著《元进士考》是重构元代进士名录的第一部著作，实际也是宋代以后学者企图重构历代进士录的先驱。在此必须对其书作一较为详细的论析。

由于此一著作在钱氏生前未能完成，《元进士考》的书名可能是后人所加^[9]。此书仅为钱氏随见随录的一个稿本，今收入《嘉定钱大昕全集》的排印本共137页，篇幅不可谓小^[10]。此书不分卷，但据陈高华教授对其内容的分析，此书可分为九个部分，仅有第六、七部分为钱氏的研究，不过48页，其余皆为资料抄录。此书录入之资料包括《元统元年进士录》、《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全文，元代科举程文集《类编历举三场文选》中部分名录、卢熊《苏州府志》及《江西通志》科第的部分，可说是钱氏所见有关元代进士资料的汇集^[11]。

在该书第六、七部分中，钱氏共考出492名进士及132名乡贡进士^[12]。钱氏考出之各进士或乡贡进士不仅前后重复，而且或仅记各人之姓名、名

次、字号、里贯、族属，或又简述官历。如延佑二年（1315）科进士的前几名：

护都答儿，元（意即右榜状元）。

张起岩，元（意即左榜状元）。字梦臣，济南。

马祖常，字伯庸，雍古人，乡、会试皆第一，廷试右榜第二。第二甲第一人。

哈八石，于阗人。以父字丁为姓，字文苑。历浙西、湖北、山北廉访金事。许有壬有《哀词》。^[13]

钱氏有关四人的记载显然详略不一，其中唯有哈八石述及官历与史料来源，对于其余各人则无交代。而且对于一般“进士录”所应有的信息如进士的家世、婚姻等状况全未着墨。可见钱氏在编录史料时尚未建立完整体例。

钱氏史学素以考证谨严著称，但此书中之资料却未经严格考证，往往兼容并蓄，录入不少可疑资料。钱氏在《十驾斋养新录》曾指出：“《江西通志·选举门》载元时进士题名，皆诞妄不足信……盖志所采者多出家乘、墓志，凡应举者，皆冒进士之名，而修志者则不能别择也”^[14]。钱氏既知《江西通志》所载可信度不高，而其《元进士考》延祐二年科自此书抄录十六人，延祐五年科抄录更多达十九人^[15]，其他各科大多亦是如此，皆未经“别择”，真伪难辨。因而，钱氏《元进士考》既不完备，亦不尽可靠。又此书虽然现已公诸于世，可惜《全集》本中相关部分校印欠精，错误甚多，已有学者提出商榷^[16]，今后研究者仍需参考钱氏原稿。总之，《元进士考》虽为重构元朝进士题名录奠定基础，提供不少线索，但仍需后代学者赓续其业。

钱氏之后百余年间，一直无人从事此一工作。幸而最近二十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先后发表相关论著：从事现存进士录整理的有王颀^[17]、杨讷^[18]，重辑进士名录则有王楼占梅^[19]、陈高华^[20]、桂栖鹏^[21]、沈仁国^[22]、高惠玲^[23]、裴淑姬^[24]等。这些论著各有贡献，均具参考价值。但是各篇论著虽然长短不同，详略互异，但或以进士录的校点为宗旨、或以进士姓名的考证为范畴，或以一科一族的进士为研究对象，不仅涵盖科次不尽完备，而且内容亦多所欠缺，作为元代乃至近世中国科举、政治、社会、文

化史研究的基础，仍嫌不足。因此，元代进士录的全面重构仍有必要。

三

《元代进士辑考》一书是笔者三十余年来从事元代进士录重构的成果^[25]。

一九七六年开始这项工作时，还不知钱著《元进士考》之存在，自然不会受其影响。所受启发主要来自柯睿哲（Edward Kracke）及何炳棣两位教授根据现存宋、明、清进士录所撰写的论著^[26]。由这些论著得知进士录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上的重要，遂开始从事现存元代进士题名录的研究，其次则着手题名录不存之各科进士资料的辑录。

本书分为正副二编。正编是核心部分，又分两部。第一部为现在仅存的两种会试进士录的校注，即《元统元年（1333）进士录》、《至正十一年（1351）会试题名记》。这两种进士题名的格式、内容互不相同。《元统元年进士录》系根据进士应举时所呈家状，于廷试发榜后汇印成书。其内容，除进士姓名、榜别、甲次外，记有各人里贯、所属氏族或种族别、户计类别、专治经书名称（限汉人、南人）、表字、出生年月日时辰、父系祖先三代名字、母亲姓氏、长辈存殁情形、婚姻状况、乡试地点与名次、会试名次、及初授官职，亦著录少数进士之兄弟、从兄弟曾登科第者。内容极为丰富，参考价值甚大。《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则是发榜后在国子监的石刻题名，仅列有进士之甲第与姓名，价值远逊于《元统元年进士录》。

元统元年（1333）的考试是元代科举第七科。在元代16科中，唯有此科取足百名进士，百人之中右榜（蒙古、色目）、左榜（汉人、南人）各50人。

笔者于1983年发表《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27]。当时，手头仅有民初徐乃昌（1868-1936）所编《宋元科举三录》本^[28]，该本鲁鱼亥豕，脱落断烂之处，所在多是。幸而近年北京图书馆馆藏之二种抄本皆已出版，即陈揆（1780-1825）稽瑞楼旧藏本^[29]及钱大昕《元进士考》中元统元年部分。此次校注仍是以《宋元科举三录》本为底本，而以二种抄本与该本对勘，文本遂较前完备。

除校勘外，另一项工作为注释。注释之重点又

有二：一方面，广罗史料就各本残缺之处加以补注。另一方面则是进士生平之考订与小传之撰写；小传内容与其它十四科进士小传大体相同（见下文），但凡本录中已提及之事迹不再于小传中重复。而本录中出现的罕见名辞，亦加简注。

至正十一年（1351）是元代科举第11科，录取进士83人。其中右榜38人，左榜45人，两者并不相等。

《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内容包括两部分：一为国子祭酒王思诚（1291-1357）所撰记文，叙述会试与廷试经过及试官名单。另一则为廷试合格进士的题名。

笔者于二十余年前初度发表《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校补》时^[30]，手头仅有王昶、罗振玉编《金石萃编未刻稿》本^[31]，不得不以该本为底本，根据其他史料，加以校正。近年来获得其他三本：一、王鸣韶编《宋元科举题名录》本^[32]，二、钱大昕编《元进士考》本，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拓本。其中王、钱二本实为一本，乃因《宋元科举题名录》系由钱氏提供资料，王氏编次成书。此次校勘，改以王本为底本，与其他三本对校。

除去校勘外，此次校注亦有二项工作：第一、进士姓名的增补：本科共取进士83人，诸本之中姓名全存或存有部分者不过73人，本文根据各种史料增补六人，因而具姓名已达79人，距83之数，相去不远。第二、小传的补写：由于本记缺乏《元统元年进士录》所具的进士身家及初任官职等资料，笔者乃为各人补写小传，附列于其姓名之下。

四

正编第二部为上述两种题名录之外十四科进士的辑录，是本书主要功力所在。

辑录取材极为广泛，包括科举程文、史籍、传记、元、明诗文总集与别集、笔记、石刻、历代方志、书目、诗话、书画题记、宗谱等。由于元代产生不少高丽进士，韩国的史籍与文集也必须查阅。加以近年各种方志丛刊及“四库”几种续编的出版以及湮没已久的程文集——两种《三场文选》——的浮现都增大史料搜求的繁难，但也使辑录内容更为丰实。史料的搜求虽不能做到竭泽而渔，但一直

悬此为鹄的。

谈及所用史料时，对上述两种程文集须稍详叙述。这两种程文集分别为刘贞等编《类编历举三场文选》^[33]及周翦编《皇元大科三场文选》^[34]。前者为会试前七科、乡试前八科程文的选集，后者所录则为至正二年（1342）一科程文。两书皆涵有所录进士及乡贡进士之姓名，里贯、名次等信息，应该可靠，有助考证。不过这两种程文集也具有局限，不仅涵盖科次并不完全，而且所收程文作者绝大多数为江南三省所产。加以海峡两岸图书馆中皆未收藏全帙，两者长埋于日本之善本书库中，罕为人知^[35]。在此值得附带一提的是过去亦为学者所忽略的一种唱酬诗文集：释来复（1319-1391）编《澹游集》。释来复为慈溪定水寺住持，交游广阔，集中收罗元季170余位与之唱和士大夫的诗文^[36]。两书唱酬者甚多为进士，皆记有官衔、出身，大体可靠，仅有少数误记乡贡为进士者。

各种史料记载的考订颇为繁难。前引钱大昕语已显示，方志多根据家乘、墓志而将应举者皆误称为进士。事实上，元人诗文中称某人为“进士”，往往亦仅为乡贡进士，如此称呼，不过出于著者下笔之礼貌。如不严加考订，所得进士可能是实际录取的数倍。过去重构列代进士的论著中常收入不少“假进士”，不可不慎。故在各科名录之末，皆列“疑误”一类，将考辨为误者列入，以免陈陈相因，以讹传讹。

在考订进士真伪时，必须建立标准。首先须根据记载中的各科录取总额、右、左榜、各族群及各地区进士录取数订下目标人数，如现知延祐二年科进士56名，包括右榜16人、左榜40人。左榜之中，汉人11人，南人则为29人，收录各类进士数目不能逾越这些额数。其次则依照每一进士相关资料之多寡与证据之强弱决定取舍。最可靠之记载为上述程文集中所记进士或乡贡信息。其次则为元代史籍、文集与石刻集中之碑传，可靠程度较低者为明朝，尤其是清朝之方志，因此对方志所列进士必须审慎处理。

在作考订时，凡方志或其他史料中所记进士，如未记载官职或所记官职不符任用规定（如授官为教职或主簿之类低职），或所记登科时间为乡试年而非会试年、或将国子释褐任官误为登进士第者，皆置于“疑误”一类。又若一州或一县在一科之中

产生多名进士，且无旁证，亦列入“疑误”。考定之进士按科次排列，科次无法确定者则列入“科次不详”一类。

在重建进士录的过程中，最令笔者困扰者为：有关各族群、各地域进士的史料，多寡相差甚远，因而可考进士人数的分布甚不均匀。载籍之中有关蒙古、色目进士之记载远少于汉人、南人，一方面由于蒙古、色目进士留有文集者甚少，另一方面乃因元亡之后，蒙古、色目后裔大多易姓改名，隐居民间，方志编纂者既无档案可稽，又不认同蒙古、色目进士为本土士人，故多不加记载。而在汉族进士之中，由于元代北方士人之文集及现存之北方方志远少于南方，现可考知之汉人与南人进士数目相较因而颇有轩轻。此一出于史料多寡之困难，不易克服。

考定之进士皆有小传，尽量列入三代祖先身份、进士本人师承、仕历、著作，兄弟、姻亲及子孙仕进资料，如三代以上祖先、旁系祖先之姓名、身分及后裔在明朝事迹可以探知者，亦加记载。传统进士录内容以父系直系三代祖先为限，近年来，过去根据进士录所作的科举与菁英流动论著颇受非议，批评者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旁系祖先及姻戚对士人前程亦有影响。对于这一争议，在此不拟评论，本书进士小传涵盖范围仍予拓展，希望能借此补充传统进士录之不足，扩大这些小传在政治、社会、文化史研究上的价值，并对贯串宋、金、元、明等朝代之各方面的研究亦有帮助，因为跨越领域与朝代当为史学研究之未来潮流。

现举二例以显示本书进士小传之内容，一为延佑二年科色目人偃哲笃，一为科次不详的南人蒋官：

例一：偃哲笃（？-1356）

字世南，畏兀氏，贯龙兴路。出身著名高昌偃氏世家，其家族遥奉唐太宗时代突厥汗国名相瞰欲谷（？-731？）为始祖，瞰欲谷后裔世为漠北及西州回鹘（即畏兀）之国相。哲笃之曾祖岳璘帖穆尔（约1196-1262）从其兄归降蒙古，仕至河南都达鲁花赤。妻奥屯氏，女真人。祖合刺普华（1246-1284），官广东都转运盐使，妻希台特勒。父偃文质，曾任江西行省理问，遂家龙兴（江西南昌），官至吉安路达鲁花赤。哲笃为

文质之第三子，登科后历任泗州同知……于至元元年（1335）移家溧阳。后又历……（至正）十年（1350）任吏部尚书，建议右丞相脱脱（1314-1355）变更钞法。十二年，调淮南行省左丞，辅脱脱讨徐州芝麻李。十五年脱脱因遭政敌中书平章哈麻（？-1356）之谮在军前解职并遭流放，哲笃亦遭波及，明年卒于流放之地大宁（内蒙古宁城县西）。哲笃长于诗文，曾任修纂《辽史》提调官。其诗今附见于倪玉立《世玉集》。此外尚有散见诗文、书翰存世。哲笃妻月伦石护笃（1301-1341），系出畏兀名门，父为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帅八里麻吉而的，母为中书左丞廉希恕之女。倪氏登进士第者有哲笃兄弟四人（玉立、直坚、朝吾、偃箴）、从兄弟一人（善着）。哲笃之子百辽逊、善着之子正宗及阿儿思兰（皆未改倪姓）亦相继及第，故倪氏二代之间，登进士第者九人，为元代最成功之科第世家。元亡前，百辽逊挈家远避高丽。倪氏后裔在中、韩二国绵延至今。倪氏家族文献今存者于中国有《沙溪倪氏宗谱》、倪映飞编《倪氏宗谱考略》，在韩国有关倪氏家集《庆州倪氏诸贤实记》及偃秉洙等编《庆州倪氏族谱》。

此一小传，除去未记师承外，与前述体例大体相合。小传反映出倪氏出自源远流长的漠北、西域贵族之家。¹³⁷归降蒙古后仍然世居显宦。哲笃兄弟却将其家族转化为元代最成功的科第世家。哲笃出身科举，却晋身宰执，成为元季权臣蔑儿乞氏脱脱的得力助手。而其家族在中、韩两国绵延不绝。本书中尚有倪氏子弟中其他八进士之小传。合而观之，这些小传涵盖此一家自古代突厥至现代的简史及家族文献。

例二：蒋官

字伯雕，号栎轩，真州（今江苏仪征）人。祖籍魏州（今河北冀县）。高祖安中，金国子助教。祖应茂，金末避兵淮南，遂家真州。父周雷，扬州医学教授。官受业于至正二年状元陈祖仁。至正初登进士，未几丁祖艰，避地浙东，用荐授行枢密院管勾。服闋，任崇明州判官，摄州事。二十六年（1366），以州降明，授翰林修

撰。洪武元年（1368）改开封府兰阳县丞。任满朝京，以疾卒。子用文（1351-1424），永乐间任太医院判官。用文长子主善，任太医院院使、余子主敬、主孝（1397-1472）、主忠，皆“以儒医鸣”。故蒋氏为一世医家庭。

蒋宫家族背景与楔哲笃全然不同。其家族是由汉人转徙为南人，并不属于显宦阶层，蒋宫本人的官职也不高。但小传显示其家族自金代至明初一直是儒、医兼营，反映宋、金以后医者地位上升，其角色与士人的转换与持续^[39]。从这两篇小传亦可看出元代进士背景与事业的多元。

每科进士名录之编排，不尽根据元朝发榜惯例。按元代进士发榜，皆分为右、左榜，右榜中的蒙古、色目，左榜中的汉人、南人并不分类排列，而是依中第名次排列。现各进士之名次不尽可考，兹将左、右榜进士依其族群及籍贯排列，族属不明者列为“族不详”，籍贯不详列为“贯不详”。同一族群之进士则依省、区、道、路排列。而士人因种种原因不在本贯考试，而在寄籍由乡贡而登进士第者则列入寄籍地区。希望如此编排能为进士之族群及地域分布之研究提供便利。

以下辑录所得十四科进士（含科次不详）共有右榜进士171名（其中蒙古42名、色目76名、族群不详者53名）、左榜进士521名（其中汉人242名、南人265名、贯不详者14名），两榜合计692名，占14科录取进士956名的72.4%。现存进士录元统元年科所取百名皆存，包含右榜50人（其中蒙古21、色目25、族群记载不明者4名，应皆为蒙古）、左榜50人（汉、南人各25），至正十一年科则考证得79名，包含右榜34人（其中蒙古1人、色目3人、族不详者30人）、左榜45人（其中汉人15、南人19、贯不详11）。两类总计871人（其中右榜255、左榜616），占全部录取进士1,139名的百分之76.5%。未能考出更多进士，主要由于右榜进士的相关资料较为欠缺。另有考定为“疑误”者280人（其中右榜7人、左榜272人），纠正载籍的缺失，亦可供研究者参考。本书所考超出钱大昕所列甚多，并且在比率上也大于前述诸学者所考出的宋、辽、金进士。

五

附编所收皆为与进士密切相关的科举文献。元廷所颁布的各项规章对研究科举制度自然极为重要。这些规章现存于《元史·选举志·科目》、《元史·百官志·选举附录》^[39]、《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礼部》、《通制条格·学令·科举》、不着撰人《元婚礼贡举考》、《历举三场文选·圣朝科举进士程序》及刘应李编《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科举》中，上述诸书记载虽然高度重叠，但具互补性。由于这些记载多为史学界所习知，而且篇幅不小，本书只能割爱。本书附编所收为乡试与国子贡试题名记及散见各处而易为学者所忽略的其它各种文献。

附编分二部，第一部所收为乡试题名记及国子贡（公）试题名记各两篇。乡试是元代科举的基层考试，廷试进士皆由乡贡进士出身，因而乡试题名记对考证进士姓名固然有甚大帮助，对了解科举制度之整体运作亦极有帮助。两篇乡试题名记为至正十年（1350）及二十二年（1362）山东乡试题名记。两篇所含除记叙考试经过及执事人员的记文外，尚保存乡贡进士题名。国子贡（公）试与科举间之关系密切。元朝科举实行之前期，科举与学校双轨并行。国子生除由公试释褐入仕外，亦可以个人身份参与乡试，循序而上。至正二年（1342）科举复兴后，国子生与乡贡进士“合为一试，异其考”，虽然进士生与国子生分别发榜，却是同场考试。而且考官相同。因而有关国子考试——尤其后期——情形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会试、廷试的进行，故将现存的两篇国子题名记一并收入本编。

附编第二部所含文献亦皆与考试及进士录有关，本部所录共分七类，或为缺少乡贡进士名录的乡试题记，或为州县进士题记、或为家族科名记录、或为有关同年小集的记载，或为科举程文或名录的题跋。最特别的则是落第士子批评考试不公的抗议文字——“非程文语”。这些文献对元代科举制度及社会、文化之研究皆有甚大参考价值。

六

二百年前钱大昕的遗著《元进士考》为重构元

虞续钱大昕的未竟之业——谈元代进士录的重构

代进士录奠定基础。今日之重构工作必须在其基础之上向外扩展。学术研究不断进步，每代都有不同的需求。今日重构进士录不得不超越钱氏规模之外，扩大其内涵。

由青丝到白发，三十年磨成一剑，可见我的鲁钝与执着。30年来，无论史料来源、研究工具与学术风尚都有很大变化。其一，在史料来源方面，许多散见海内外各图书馆的珍本，现已出版或可取得。此书迁延甚久固然是由于我的舒缓与迟疑，但忙于吸纳源源不绝的新史料也是一个原因。而且，如果提前20年，甚至10年出版，本书的面目与今日必然大有差异。其二，在工具方面，30年前尚是书库钻研，卡片抄录的手工艺时代，今日研究工作已进入网络时代，高度仰赖由网络检索资料，而在计算机存盘。我们自然必须与时俱进，改善工具。但是工具的进步固然方便研究不少，却也导致学术要求的提升。其三，在学风方面，30年前科举制度在中国大陆被诋誉为历史的糟粕，“封建官僚”产生的温床，科举研究是学者不敢践履的禁地，这一范畴的命脉端赖少数台、港、海外学者的维系^[1]。我开始这项工作时颇感到踽踽独行的寂寥。今日科举研究却蔚然成为一门显学。最近更有学者提议建立“科举学”，使科举成为一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一提议得到颇为广泛的正面反响^[2]。未来的科举研究显然将会更为蓬勃。希望本书的完成能够弥补重构历代进士录连锁中的失落一环，并且为今后元史及近世社会文化的研究增添一方有力的基石。

笔者过去曾根据本书各部分的初稿，发表《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元朝蒙古色目进士背景的分析》、《元朝南人进士分布与近世区域人才升沉》、《元代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及《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等篇论文^[3]，可说是以元代科举为主轴所作涵盖不同族群、地域与朝代的探讨。衷心期盼今后学者参考《元代进士辑考》中的资料写出更具意义的论著。

注释：

[1] 关于钱大昕对元史研究的贡献，参看黄兆强：《清人元史学探讨——清初至清中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0），第73-206页；吴宗儒《清代学风与清儒的元史学》（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

文，1998），第52-64页。

[2] 例如文学史家傅璇琮便高度评价徐着，见傅氏《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2页。

[3] 近年为《登科记考》增补者有孟二冬、张忱石，见孟氏《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张氏《唐代登科人名录拾遗》，《文史》2008年第3期，第101-158页。

[4] 《元进士考》稿本度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传记类，第31页。

[5] 关于进士录及相关科举文献的讨论，参看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41-359页。

[6] 傅璇琮、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考》，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7] 朱子方《辽代进士题名录》，《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4期，第24-34页。

[8] 薛瑞兆《金代科举》（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84-257页。

[9] 据杨讷推论，见杨氏《关于〈元统元年进士录〉的版本与校勘》，收入《祝贺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中国史论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第329-336页（第331页）。

[10] 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5册，第1-137页，《元进士考》。

[11] 陈高华《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兼说钱大昕〈元进士考〉》，收入陈氏《陈高华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第168-210页。

[12] 据陈高华之统计，见陈氏《两种〈三场文选〉》，第199-204页。

[13] 钱大昕《元进士考》，第38-39页。

[14]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4，第372-373页，《江西通志》，收入《嘉定钱大昕全集》第7册。

[15] 《元进士考》，第40-41，43-44页。

[16] 陈得芝《〈嘉定钱大昕全集〉元史著述部分点校勘误》，收入陈氏《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721-737页；沈仁国《〈嘉定钱大昕全集·元进士考〉点校补正》，《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0辑（2008），第121-139页。

[17] 王颀点校《庙学典礼·外二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中之《元统元年进士录》点校,第171-226页。

[18] 见前引杨讷文。

[19] 王楼占梅《〈伊滨集〉中的王征士诗》一文中列有所辑延佑二年进士名录,载于《史学汇刊》第12期(1983),第57-76页。

[20] 陈高华《元泰定甲子科进士考》,收入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州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48-164页。

[21] 桂栖鹏《元代科举中的高丽进士》、《元代色目人进士考》、《元代的蒙古族进士》及《元代进士误载举正》,皆收入桂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

[22] 沈仁国《元延祐进士再探》,《燕京学报》新20期(2005),第25-54页;《元至顺庚午科进士考》,纪念韩儒林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南京大学,2002;《元泰定丁卯科进士考》,《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2002)第15辑,第76-90页;《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甲午科进士续考》,《学海》2003年第2期,第151-156页;《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末四科进士续考》,《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6辑(2003),第195-204页。

[23] 高惠玲《高丽士大夫与元制科》(韩文),《国史馆论丛》第24期(1991),第181-214页。

[24] 裴淑姬《宋元时期的高丽进士》,收入刘海峰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92-206页。

[25] 此书将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26] E. A. Kracke,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0(1947), pp. 103-121; Ping-ti Ho何炳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27] 《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食货》(复刊),第13卷第1、2期(1983),第72-90页;第3、4期(1983),第47-62页。

[28] 《宋元科举三录》,1923年刊本。

[29]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1册,第373-

419页。

[30] 《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校注》,《食货》,第16卷第7、8期(1987),第69-84页。

[31] 《金石萃编未刻稿》(上虞罗氏貽安堂刊,1918),卷下,人字,页34上36下,原题作〈元辛卯会试题名记〉。

[32] 王鸣韶编《宋元科举题名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1册),题作《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第243-266页。

[33] 《类编历举三场文选》,静嘉堂文库藏至正元年建安务本书堂刊本。

[34] 《皇元大科三场文选》,内阁文库藏至正四年刻本。

[35] 陈高华《两种〈三场文选〉》;黄仁生《元代科举资料三种发覆》,《文献》第1期(2003),第95-105,177页。

[36] 释来复辑《澹游集》,续修四库全书。

[37] 关于高昌偃氏,参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励耘书屋本)卷2,第28下39下页;萧启庆《蒙元时代高昌偃氏的仕宦与汉化》,收入萧氏《内北国而外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7),下册,第706-748页;《元季色目士人的社会网络:以偃百辽逊青年时代为中心》,收入萧氏《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第85-116页。

[38] 邱仲麟《绵绵瓜瓞——关于明代江苏世医的初步考察》,《中国史学》,第13期(2003),第45-68页。

[39] 有关元代科举规章的讨论,参看陈高华《元朝科举诏令文书考》,《暨南史学》(2002)第1辑,第153-172页;森田宪司《元朝の科举资料について——钱大昕の编着を中心に》,收入森田氏《元代知识人と地域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04),第166-195页(第185-188页)。

[40] 陈兴德《二十世纪科举观之变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1] 刘海峰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刘海峰等编,《科举百年祭》,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42] 以上各文皆收入拙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及《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二书中。

(作者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清代八股文选本稿本文献价值初探

马 鏞

摘要：清代八股文选本稿本有多种名称，但其内容都是八股范文。质量较高的选本稿本，对于研究清代儒学、文章学、科举史与教育史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八股文；选本；稿本

八股文选本稿本，主要是指为帮助考生应对科举考试而刊刻的八股文范文专辑。所谓选本，是选多人所作的八股文；所谓稿本，是选一人所作的八股文。有些八股文稿本，是作为作者文集的一部分出版的，但同时也具有八股范文的功用。科举制度停废之后不久，八股文迅速淡出人们的视野，长期以来，由于对八股文的不重视，导致八股文选本稿本的零落散失，如商衍鎏所说：“选集刊刻，指陈家数，自明至清，汗牛充栋之文，不可以数计。但藏书家不重，目录家不讲，图书馆不收，停废科举八股后，零落散失，覆瓿烧薪，将来欲求如策论诗赋之尚存留于世，入于学者之口，恐不可得矣。”^[1]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才开始逐渐重视八股文。如高明扬、邱敏所说，学术界对八股文从以前的“激情的批判”回归到“理性的思考”，对八股文的文体、八股文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2]但是，对八股文选本稿本的文献价值，目前尚少探讨。为此，本文尝试从文献学的角度探索清代八股文选本稿本的价值。

一、清代八股文选本稿本的名称和质量辨析

清代八股文选本稿本的名称有多种，顾炎武在

《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里，引用明末杨彝的话，把八股文的选本稿本分为四种：“曰程墨，为乡、会试主考官考拟作，及检择中式士子之作；曰房稿，为十八房进士之作；曰行卷，为举人本房之作；曰社稿，为诸生会课之作。”除此之外，八股文选本稿本的名称还有以下几种：

“闱墨”，即上文所说的“程墨”，由乡会试主考官刊刻，选取乡会试中式文章，作为今后考生的范文。如《光绪辛卯科广东闱墨》，光绪十七年（1891）聚奎堂刻本；《光绪丙戌科会试闱墨》，佚名辑，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朱卷”，为乡试、会试新录取试卷的专辑。朱卷原为经朱笔誊写后送考官评阅的试卷，但科举考试后刊刻出版的试卷亦称朱卷。朱卷的刊刻，原本是新科举人或进士用来分送亲友的，但由于这些朱卷都是乡试、会试新录取的试卷，最能反映科举考试出题倾向、考官喜好和评判标准等方面的新变化，因此成为备考士子揣摩仿效的重要资料来源，书商也乐于搜集并编刻朱卷。如《儒林外史》第十三回就有嘉兴书坊贴出“报贴”：“本坊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乡会墨程，凡有同门录及朱卷赐顾者，幸认嘉兴文海楼书坊不误”，就是生动的一例。

“墨卷”，与朱卷名异议而实同，为乡会试后出版的试卷专辑，多为书坊选编。如道光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高敏选编、“联墨堂”连续刊刻的《墨卷大醇》新编、二编、三编、四编。有的则是考生自发编的，如《光绪甲辰科恩科会试第十三房同门墨卷》。

“课艺”、“课文”、“试艺”，为学校平时考试八股文的范文专辑。如从家塾八股文中选编的有：《俞氏啸月轩试艺》，光绪丁酉（1897）海虞留余书

屋重刊本，这是俞家子弟考课时所写的八股文；从书院考课中选编的有：《云间课艺》，陆梓、顾文鳌参订，嘉庆九年（1804）刻本；地方官学的学生八股文课艺：《绍兴府学课艺》、《三州学录》等等。

“制艺”或“制义”，多为编者从自己所作的八股文中挑选编辑的稿本。其中既包含了作者考取乡试、会试的考卷，也有作者在私塾、书院或官学中所作的，甚至还有为官之余所作的八股文。这类文章一般放在个人文集里，作为单独的一卷或若干卷，并标以“某某人制义”，如：《凝斋先生遗集·制义》，陈道撰，嘉庆四年（1799）善余堂刻本；有的则单独成书，直接以某人或某斋制义命名。如《葵青居制义试帖稿》，石渠撰，稿本。但也有一些制义是各家八股文的合集，如俞长城编：《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四十八卷；王先谦编：《江左制义辑存》，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

“时文”、“四书文”，其实它们与“制义”相同，为八股文的文集。如：《潜虚先生时文全集》，戴名世撰，清抄本。《邹泰和学士公四书文》，邹升恒撰，道光二十七年（1847）锡山邹氏慎德堂刻本。

八股文选本稿本名称多种多样，其资料来源、选编者也有多种。从资料来源看，可以分为科举考试试卷、学校考试试卷、个人闲暇所作三种。其中科举考试的试卷因为是考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写作功底较扎实；而学校考试的试卷，则实为习作，在写作功力上可能还欠火候。个人闲暇所作的八股文与前两种相比，数量很少，但因并不为科举考试，而纯为自己的写作爱好所驱动，且没有时间限制，精雕细琢，所以往往有八股佳作。

从选编者来看，可以分为官编、私编两种。私编中又可分为：书坊选编、学校选编、个人选编三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个人选编的八股文稿本，其文章质量较高。尤其是一些名家的八股文，其质量更不待言。如《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中，有高鄂的《兰塾制艺》，为高鄂的手稿，且有同年、同僚的题词、眉笔、行注、后记，为研究高鄂的原始资料之一。书坊编的选本则比较复杂，其中既有认真编刻、多次再版的，也有粗制滥造的。

二、八股文选本稿本的儒学文献价值

清统治者以八股考试士子，号称是要“代圣贤立言”，要求士子沉潜于儒家经典中，认真领会圣贤的

精神实质，然后正确地阐述经典的内容，替圣贤说话。但每个人的知识水准、看问题的角度都有所不同，所以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经典，阐述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不可能完全站在圣贤的角度上发言。现在所见的一部分较好的八股文，大多较忠实地阐述经典的原意，同时也渗透了自己的儒学观点。以下，让我们以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会试的第一篇八股文为例，来看士子是如何阐述并发挥自己的儒学观点的。

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会试的第一篇八股文的试题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此题出于《论语子罕》第九。原文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为节省篇幅，我们只摘录各篇八股文的破题承讲和收结，因为最能反映一篇八股文观点的是作为点明主题的破题和承讲，以及作为结论的收结：^[3]

姓名：吴庭芝

破题：达巷有通人，尚识圣人之大也。

承题：夫党人何足异，异其能知圣人耳。

收结：称其博学，又称其无所成名，党人何幸识孔子也！或曰，党人，童子也，夫子固师之矣。

姓名：陈君耀

破题：时人以大尊圣，录之存史例也。

承题：夫党人所谓大，非知圣者也。然尊其词曰孔子，是可系于尚论列圣后矣，非史例哉！

收结：遇得而穷之业，不得而穷之所以。后王有兴，既加以神圣之称，复上以王公之号，亦足发潜德之幽光也。彼党人何必见及此。观博学无成名之言，记者节取以存史例可见。

姓名：尹铭绶

破题：尊圣以大，慕圣之心可见矣。

承题：盖自有六艺以来，宗孔子一人而已。大哉一叹，党人固慕之深哉！

收结：盖党人慕不官不器之诣而莫见其端倪者，亦仅知其大也，岂真见孔子之全体也哉！故始则美其博学，继则惜其无所成名。此亦党人之大孔子而已。

姓名：王照

破题：党人以大称圣人，无知若有知焉。

承题：夫孔子之量，非达巷党人所知，而就所窥

见，已叹其大焉，则矢口之余，不啻能知圣耳。

收结：进观博学无名之言，党人盖于大之中，莫名其妙耳。圣人谦以受之，而大之真愈见。

姓名：陈瑞玉

破题：以大赞圣，非尽无识也。

承题：盖孔子之大，非党人所及知，而其语实足以发之，亦岂尽无识哉！

收结：要之，党人所谓大者，得粗遗精，不足尽孔子之全，量孔子之所由大者。下学上达，不妨引党人为同心，闻其言而商所执，亦岂以党人为无识耶？

姓名：李祖年

破题：论圣者能见其大，真知圣人者也。

承题：夫孔子之大，非浅识所能窥，而达巷党人知之，大哉一叹，殆真知圣人者欤？

收结：乃斯人具有真知，何妨节取片言，为尼父补世家之赞。博学无所成名，惜子乎，抑誉子也。

姓名：夏启瑜

破题：论圣人而叹其大，不可谓非知圣人者也。

承题：夫孔子为万世师，惟其大也。党人大哉一叹，安得谓不知孔子哉！

收结：党人能知孔子之大，即党人之见亦大也。进言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孔子所以大欤？

姓名：吴敬修

破题：人以言传，以其知圣人之大也。

承题：夫孔子之大，岂达巷党人所能知乎？然其言曰大哉孔子，则不得谓非深知孔子者。

收结：惟大故博，故党人谓无所成名，正孔子之大无能名也。其词若有惜焉，其实乃深誉之，宜孔子承之以谦也。

姓名：刘廷琛

破题：以大赞圣，时人之特识也。

承题：夫圣至孔子大矣，而其论自达巷党人发之，遂为万世称圣之定论，故特志之。

收结：大哉一言，党人足千古矣，又奚惜其姓氏之无传也哉！

姓名：靳学礼

破题：揭圣人之大，自党人开之也。

承题：夫帝尧以后，不愧圣人之大者，厥惟孔子。乃其言自党人发之，岂得仅以党人目之。

收结：虽不必即知圣人，而揭圣人之大者，自党人始，可知州党之论，亦未尝无卓然可传者也。

姓名：吴式钊

破题：赞圣者浑举其大，识亦超矣。

承题：夫赞孔子难，赞孔子而浑一言尤难。达巷党人乃以大哉称，其识为何如！

收结：嗟乎！金声玉振，集群圣而俎豆如新，诂料此偶而称扬升歌者，竟播之千古；荷蕢接舆，托微词而性情未会，岂若此片言，居要授简者几莫赞一词。又申之曰博学无所成名，亦民无能名之意，所以形容其大耳。夫子闻而不遽受，且以六艺之末诏门人，正圣人之大也。

姓名：江春霖

破题：圣极其大，时人亦有能见及者也。

承题：夫人在达巷，宜非知孔子者。赞以大哉，亦岂未见而云然乎？

收结：夫学博则愈见其大，大而至于无可名，斯大之所以化也。窃为孔子进一解矣。

以上同一个题目，十五篇八股文，虽然在阐述时总体上忠于经典，但对于达巷党人赞叹孔子的看法上有很大差异。如吴式钊、靳学礼、李祖年对之高度赞扬，认为是“真知圣人者也”“识亦超矣”；吴庭芝、尹铭绶、王照、陈瑞玉、江春霖、吴敬修等人则有保留地加以赞扬，认为虽然达巷党人不可能真知孔子，但毕竟“无知若有知”，“尚识孔子之大。”陈君耀则认为党人非知孔子者。

对党人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上述八股文的解释也各异：尹铭绶认为是党人见识不够，李祖年、吴敬修、吴式钊认为是党人对孔子的赞誉，夏启瑜认为这正是孔子之大，江春霖则把“无所成名”理解为“无可名”。

再对照朱熹《四书集注》的有关解释：“达巷，党名，其人姓名不详。博学而无所成名，盖美其学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艺之名也。”^[4]可见，在上述八股文中，士子的解释并不完全遵照朱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见解，反映了当时士子对儒家学说